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4.02.010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叙事

——以社会正义为考察视角

蔚佳霖, 王 翔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沙 410000)

摘要: 一个理想的文明形态代表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期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这一文明形态必将首先以一个高度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加以表征。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向度加以叙述, 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旧文明形态非正义的超越中, 构成了对上述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这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形塑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未来发展前景, 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语境。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 政治经济学; 社会正义

中图分类号: D61; G1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24)02-0101-09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庄重宣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3]}。可以看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 又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新样态表达”^[3], 因此对这一最新样态表达进行研究阐释极为必要。事实上, 在新时代的中国,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表达具有多重面相、多样体现, 其既在社会政治领域彰显, 又于社会文化领域体现, 更有社会经济范畴的叙事表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经济范畴的叙事表达是其在社会政治领域彰显和社会文化领域体现的基础, 因此要从经济范畴着眼, 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的叙事表达。“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社会正义更构成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正体现在对“正义”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回应上, 因此要以马克思正义观为理论遵循和考察视角, 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正义叙事、分配正义叙事、交换正义叙事与消费正义叙事。总之, 从经济范畴着眼, 以社会正义为考察视角, 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全面系统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实践中规避旧文明形态, 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弊端, 超越传统的现代化理念, 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收稿日期: 2023-06-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的实践及经验研究”(23CDJ021);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意蕴研究”(CX20230146)

作者简介: 蔚佳霖(2001-), 男, 山西朔州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王翔(1977-), 男, 湖南浏阳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一、生产正义的映显：人类文明新形态政治经济学叙事的生产向度

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4]186}，因此，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正义”叙事极为必要。“生产正义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下对作为人类基础性存在方式和社会关系之深刻本体的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正义追问。”^[5]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生产活动的正义追问

一是劳动者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新技术的蓬勃发展，生产活动的大机器时代迅速到来。劳动者并没有从大机器生产中获得一定解放，反而沦为机器的附庸，他们在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弱化，以至于“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4]120}。这种重复的机械劳动事实上剥夺了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最终致使“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4]120}，这就意味着生产活动对劳动者来说“不是满足一种需要”^{[6]270}反而“成了破坏的力量”。

二是劳动者与生产活动产品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工人与自己的生产活动所创造产品的关系是一对异己的关系。即伴随着生产活动的进行，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产品越来越多，但这并不代表劳动者价值、财富的增加，反而表现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4]158}。因此经济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进步与获得，社会的繁荣也仅仅与资产阶级利益密切相关，作为一切进步创造者的劳动者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变得越来越畸形。

劳动者生产活动的单调重复让其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滑向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对立实质上表征着二者关系的异化危机。在双重异化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的朝向是非人性与非道义性的，劳动者的自我提高无法于生产活动中生发。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7]，所以对旧文明形态的正义追问要始终关注“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一方面要重新组织生产活动，让劳动者从机器抑或是其他生产工具之下解放出来，让其最大程度上拥有“发达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则要重新审视劳动者与其生产活动产品的关系，让劳动者能够充分发挥其“发达的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为劳动者提供了掌握多方面劳动技能的机会，党和国家通过大力投资教育的形式提高劳动者的整体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通过职业培训、技能培训等途径让劳动者掌握更为全面的技术，让劳动者群体能够在更高层次的、更令其感兴趣的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即在分配中充分肯定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让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能够用于劳动者的自我提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实现，只有这样，劳动者才愿意充分发挥其“发达的生产力”。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生产关系的正义追问

生产关系揭示了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义追问也应该延伸于生产关系的论域。

一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力视为可供买卖的商品，因此劳动供给的无常变化会让劳动者时刻面临失业的风险，这导致劳动者的就业难度激增。为此劳动者不得不倾力于内部竞争，通过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等方式力求在有限的劳动供给中竟得一席之地。如马克思所言：“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8]737}。无序的内部竞争撕裂了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得以团结起来的契机难以出现，这极大地削弱了劳动者群体的力量。与此同时，资本家群体则受利益驱动很容易就达成共识，在他们倾力合作下，“资本家的国际协会出现了，资本的统治是全球性的”^[9]，他们采取诸如维护市场垄断、压低工人工资等形式，致力于让工人内耗持续。

二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购买劳动，进而成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自然归资本家所有。

如前述,生产活动对劳动者而言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但是对占有劳动产品的资本家而言却成为享受与财富的源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6]276}。因此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这种对抗性的具体表现就是劳动者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与支配。与此同时,这也催生了二者关系的物化,即对资本家来说“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6]363}。

总之,无论是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恶化,还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关系的异化与物化,都表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趋于非理性与非道德性。无论是劳动者的自主、团结还是尊严都不能从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取得。“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是马克思为对旧文明形态的正义追问指出的进路。一方面,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自由人联合体”,“联合体”中的劳动者相互之间应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因为劳动者终将把自己何以至此的秘密看破,也必将“在就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8]737};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应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并管理,也就是消除这种不公平的所有权规律,代之以更为公平合理的所有权规律,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剥削,让劳动者免于陷入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平等关系的境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铺就了实践进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国“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10],消解了旧文明形态剥削劳动者的“所有权规律”。同时,党和国家引导、鼓励劳动者之间的行会、协会组织发挥作用,包括中国日用杂品流通协会、中国植物油行业协会等等,这些民间组织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劳动者之间盲目的竞争,进而实现了对劳动者群体整体利益的有效保障。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生产方式的正义追问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8]874}。简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呈现高度社会化的形式,生产过程的环节众多且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理应不断增强,但事实上生产资料却长期为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垄断为资本家带来了利益,但也导致了生产的无政府、无计划与盲目逐利状态,社会化的大生产难以被良性调节介入,因此它定然是不可持续的。在这种生产方式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混乱纷至沓来。20世纪上半叶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导至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两次世界大战均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的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要归责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为生产资料“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11]398},所以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在它自己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它自我否定的条件^{[12]141}。要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就要充分利用其所创造的自我否定,一劳永逸地把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社会协作从资本家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关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并致力于哺育治本之策。即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13]。充分运用市场规律,让市场规律决定资源配置,又辅之以必要的计划手段,通过国有经济、计划手段等方式来实现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并借此优化资源配置,克服资本扩张的无序和生产的无计划,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分配正义的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政治经济学叙事的分配向度

苏格拉底曾言:“正义是给每个人适如其份的报答”^[14]。其所谓的“适如其份”,就是衡量分配正义与否

的关键。分配正义是对分配的历史之维、价值之维与保障之维三个维度的全面正义追问。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历史之维分配的正义追问

在包括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在内的旧文明形态的社会表征中,分配的非正义蕴含在其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中。即在那些旧有的文明形态中,国家与社会制度均是为包括地主、资本家等在内的特权阶级服务,这些制度的订立让他们将已有私有财产和生产资料传承下去,将现有分配关系长久维持下去成为可能,并以此来保障其统治地位的长久稳固。恰如马克思所言:“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5]³³。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借助祖先传承下来的生产资料享有财富分配的特权,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分配中取得其应有的份额,但由于制度为既得利益者所设计,这样不公平的分配模式得以在制度的保障下传承下去,并且不断成为下一代分配非正义与贫困的起点。也就是约翰·E·罗摩所指出的,“这种制度允许财产分配被积累为代代相传的巨大的不平等”^[16]。

对分配特权代际传承的正义追问,要聚焦于超越构成分配特权代际传承的制度逻辑,即国家的法律、制度理应是为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订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先天不承认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特权,也必然不能容忍分配特权的世代相传,而是致力于带给每一个社会中的人公平的分配起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个人提供了崭新的起点。一方面,我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党和国家制定一切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理念从根本上不承认少数人享有分配特权而是致力于促进分配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个人私有制,破除了生产资料的代际传承,彻底清除了滋生分配特权代际传承的制度土壤。再一方面,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历史遗留贫困的问题,为因历史原因而致贫的人群提供了精准帮扶,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主政福建期间曾“一举解决了历史上长期遗留的茅草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问题,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创造了有利条件”^[17]。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价值之维分配的正义追问

分配特权的代际传承在造成“历史之维”分配非正义的同时,也引致“价值之维”分配非正义的现世出场。在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代表的旧文明形态中,分配非正义在价值维度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常被漠视,另一方面是不同劳动创造的价值易被混淆。

在资本主义社会,谁劳动谁受益的合理规则无法开显。由于生产资料为资本家占有,劳动者为维持生存只能像出售商品一样出卖其自身所拥有的劳动力,劳动者从资本家手中所能取得的也仅有维持其劳动力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事实上,劳动者所得报酬与其实际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鸿沟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商品(他的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则是商品的买者”^[18],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中,让劳动者无法从分配中取得其应得的一切。

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劳动的价值易被混淆,这让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难以被真正彰显。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行业劳动者所从事的具体劳动通常被抽象化为一种通用的“劳动”,从“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8]⁶⁰,并进一步用货币度量这一价值,这样虽然让各个具体劳动的价值变得可比、可衡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不同劳动的性质差异,让部分劳动的独特性被忽视,也让某些类型的劳动价值被低估。而价值被低估的劳动自然无法以合理的货币来体现,分配到劳动者手中的报酬自然会受到影响。

无论是“按劳分配”难以落实还是劳动价值难以彰显都切实伤害到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对其进行的正义追问一方面要求明确“按劳分配”是分配正义的应有之义。劳动者分配所得应该与其劳动成果多寡紧密结合,其所创造的一切价值在做必要扣除之后都归他所有,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11]²。另一方面,要清楚界定不同劳动的价值,即可以透过抽象化的劳动观察其

背后的经济关系,进而分析劳动者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应从具象化的劳动中界定不同劳动的特殊价值,并为其特殊性所在分配给应得的报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了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19]73}。以“按劳分配”为遵循是对所有劳动价值的充分尊重,让劳动者都能从其创造的劳动中价值获得合理报酬;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又做到了对蕴含在不同劳动中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兼顾,这能够让不同劳动的特殊性都能得到充分彰显,并以此来激励劳动者,充分调动所有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保障之维分配的正义追问

“最不利者”是指那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最劣势地位的人群,他们的最劣势地位是在历史的抑或是现世的等多重时空境遇中造就的,他们既可能源于在“历史之维”中所指出的因分配特权代际传承而导致的贫困,也可能源于在“价值之维”中所指出的因劳动价值被剥削而引致的赤贫。即使在按劳分配条件下,也可能因为自然禀赋不同而产生一些社会的“最不利者”。在旧文明形态中,这些“最不利者”往往被视为自然选择的对象,他们难以参与到最基本的社会分配之中。受资本逻辑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并不主张在社会分配中对“最不利者”进行保障,反而认为“目前人类的福利及其达到这最后完美状态的发展,都要依靠一般有生命事物受其制约的这一有益又残酷的戒律”^[20]。

旧文明形态所奉行的残酷“戒律”是对“最不利者”尊严与权益的践踏,因此对其进行的正义追问要着眼于“保障”一词,“保障”即意味着对“最不利者”的保障。马克思一向是“按劳分配”的大力倡导者,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指出了“按劳分配”可能会出现因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为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扣除”的概念,它要求从社会总财富中抽取一部分用于保障社会最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扣除包括社会福利、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11]17}。罗尔斯也提出了为保障“最不利者”的“差异原则”,他指出,“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21],其意在分配应考虑最弱势群体的需要,使他们不至于被社会边缘化,他所主张的具体措施就是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敌视的福利制度和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引入了再分配,致力于不断“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19]73};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即“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19]93}。总之,要最大程度上凝聚政府、社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消灭极端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全力以赴保障中国社会的低收入群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以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三、交换正义的突显:人类文明新形态政治经济学叙事的交换向度

恩格斯曾言:“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22]。从中可窥见交换正义与否的重要性,概括来讲,交换正义是对人际交换、国际交换和代际交换三个层面交换的深度正义追问。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人际交换的正义追问

人际交换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际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际交往的非正义滋生自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的全面沦落。

从社会公德来看,资本逻辑下调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既破除了旧有的封建思想枷锁,又不加甄别地将一切旧有的道德、宗教、哲学一扫而净,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道德价值观。这种道德价值观扭曲了家庭伦理、婚姻制度,“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

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5]33}。

从个人私德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道德沦丧的境况下,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更多表现为一种商品化的关系,人际交往实质上以追逐利益为导向,每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其在交往中的道德考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5]34}。

道德的沦落为人际交往的非正义培育了沃土,对人际交往的正义追问实为必然。在社会公德方面,遏制社会关系走向金钱化趋势是关键,这呼唤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要让这一价值观如资产阶级价值观一样,“斩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15]34},势如破竹地“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3]33}。在重构个人私德方面,社会公德的重塑必然激起多数社会中的人“情感的神圣发作”^{[15]34},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等多种公共情境引导、激发人向好向善的方面,将人的价值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中解放出来,让人的交换价值复归为人的尊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刚柔并济,力图以崭新的社会道德风貌引领人际交往关系。一方面以法律手段为道德底线兜底,即“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24]。另一方面以培育教化道德风尚塑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指出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24]。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国际交换的正义追问

在此可以用国际交往关系来理解国际交换关系。在历史上,旧文明形态的国际交往一直都表现为各种非正义的形式。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大多出于获取人口、资源、商品销售市场等目的,交往方式则往往为征服、奴役、劫掠等等暴力对抗的形式。无论是亚历山大东征还是罗马帝国的扩张历程无不是交织着血与火的国际交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国际交往模式生来就是非正义的,大航海时代以透支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发展潜力为代价成就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他国的交往也以不平等交往为基础展开,具体则体现为利用贸易壁垒、关税保护、金融垄断等诸多形式以攫取利益为目的开展国际交往。因此马克思认为彼时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36}。

归根到底,正是弱肉强食法则支配着一切旧文明形态的国际交往,因此对其进行正义追问是新文明形态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已经走过了“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8]822}历程,唯有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让所有国家都能从双边或多边交往中获益才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可持续之道,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快产业转移、打破贸易壁垒、监管国际金融市场等形式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扶持。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积极利用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优势来谋求自身的快速发展是其在国际交往中谋求有利地位的必由之路。质言之,实现国际交往正义的实践指向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改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2]61},同时也努力“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2]62}。在培育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着眼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62},推动多边机制、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助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建设。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代际交换的正义追问

代际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代际交往关系。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旧文明形态,其代际交往常常是非正

义的,这集中体现对现世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未来世代的发展权益遭到损害。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36},但与此同时到来的是自然界“新陈代谢”的阈值不断被打破,生态危机在全球蔓延的态势逐渐形成。自然界本身是具备自我调节即“新陈代谢”能力的,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生产趋于无限制的扩张,使得“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579},自然界自我调节的阈值被打破即“新陈代谢”的局部断裂形成;其从局部扩散至全球依然要归因于资本逻辑,即“由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需要,英国土地的肥力很快就被耗竭了,因此需要大量的‘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这大量的鸟粪则正是从‘遥远的国家’进口的”^[25],这样就使得其他国家“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也被伤害,如果对此不加以限制,必然会引发“新陈代谢”的全球断裂。对未来世代而言,在生态危机全球蔓延的境况下,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所有发展权益都无从谈起。

“新陈代谢”的断裂在破坏自然循环的同时也损害了未来世代的发展权益,因此对其进行的正义追问一方面要求明确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是在共生中寻求共荣的关系,而非统治与占有的关系,即“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2]560}。另一方面,要求明确当代与未来的关系是接续奋斗的关系,因此应站在对未来世代负责的高度,将包括“土地肥力”等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传承下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范式规约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深刻认识到“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2]23};另一方面则高度重视未来世代的发展权益,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谋求生态效益,即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23}。

四、消费正义的表显:人类文明新形态政治经济学叙事的消费向度

消费是社会经济运行最终环节,也是前三个环节的落脚点所在。“人的消费,一种是基于人自身的肉体需要的消费,另一种则是基于人的本质的需要,即人在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中需要的消费。”^[26]因此,消费正义是对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消费的周密正义追问。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个人消费的正义追问

在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代表的旧文明形态中,个人消费的非正义集中体现在物质消费的盲目与精神消费的匮乏两个层面。

一是物质消费走向盲目层面。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类生活的缺失,因此“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163},人的占有仅仅是个人的生活手段。在此情况下,“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4]190},人成为一个片面的“经济人”,其消费也是出于为获得“拥有的感觉”而盲目追逐。这种消费的盲目性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不断扩大,进而导致在对消费盲目追逐的过程中,每个人渐渐将消费行为视为一种竞争和攀比的手段,进而在竞争与攀比中将消费行为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这一自我实现是“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4]224}的满足,即拥有更多、更贵、更精致、更时尚的商品就是个人价值的鲜明彰显。

二是精神消费趋于匮乏层面。一方面,作为片面的“经济人”,其价值只在物质消费层面得以彰显,个人

的道德品质、贡献能力等精神品质则被忽视,所以个人对精神品质的追求降低。另一方面,物质消费的过分扩张必然挤占精神消费的空间,这让高质量、有内涵的精神产品消费无人问津。在优秀精神产品无人问津的同时,诸多低成本的如电影、电视剧等快销精神产品却大行其道,这些产品中所融入的价值观、消费观等实质上是为物质消费服务的,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物质消费。

放任物质消费的盲目与弥漫实质上是将人“单向度”看待,因此对其进行正义追问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费洛姆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将一切用以物质财富来衡量,“这两种体系都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它们的目标都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财富”^[27]。但是在物质财富已经丰硕的今天,应该重新确立一个关注人本质的消费模式,即个人的消费既有合理的物质消费又有适当的精神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互为表里互相补充,从而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本质的复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给予同等的地位,既要物质富裕又要精神富足,即“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2]23},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时代十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人民物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产品竞相登场,无论是真实反映时代变迁的主旋律电影,还是唱响新时代的音乐作品,都切切实实充实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真正做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社会消费的正义追问

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4]223}。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的需要变得扭曲,并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形成。

因此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从丰盛和消费的日常性及其全面暧昧的层面中可以感受到的后果就是:它们总是同时被当作神话(超越历史和道德的幸福假定)来体验,又被当作对某种新型集体行为方式进行适应的一种客观程式来忍受”^[28]。可以看出,消费一方面被包装、设计成一种人人都接受且乐于接受的形象即神话般的形象,在这一形象的掩饰下,“消费”被视为能够带来幸福和满足的神奇力量,全社会的思潮都将商品消费与幸福划等号,人对幸福的追求具象化为对消费的追求,人成了社会消费的奴隶,成了物质欲望的奴隶;另一方面,追逐消费也成了社会的大势所趋,它代表了集体行为方式,如若不愿成为社会异类,便只能囿于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对消费的扭曲化给整个社会套上了枷锁,对其进行的正义追问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应该认识到,消费并不能给予人幸福,反而是欲壑难平的来源。因为消费与幸福这一等式搭建于资本市场的精心设计,因此而催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倾向事实上并非消费者的积极主动参与,而是被动的安排的结果。当整个社会的消费都为各种形式的安排所操纵时,消费得到的幸福感只能是短暂的,消费欲望无法满足则成为每个人不断痛苦的来源,只有“用真实的需求取代虚假的需求”^[29]才是合理的社会消费。另一方面,因为消费社会具有集体排他性,迫于客观现实而不得不适应这种行为方式的群体必然在对消费的追逐中更多地感到不安,这也导致了社会关系注定走向不和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倡导适度消费的原则,引导社会消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协调,即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消费规模,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引导群众增强生态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倡导合理适度消费”^{[23]362};另一方面,则极力避免社会消费集体行为方式的形成,即在消费供给中,“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30],让不同收入群体都能通过一般消费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需要,避免让其在消费中感到不适,进而保证社会的长久和谐。

五、结语

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向度加以阐释,这四个向度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逻辑。创造人类文明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为中国社会经济高度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引。在生产向度,人类文明新形态映显为对生产活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三个方面的正义回答;在分配向度,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为对历史、价值与保障三个维度的正义回应;在交换向度,人类文明新形态突显为对人际、国际与代际三个层面交换的正义回复;在消费向度,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显为对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正义回响。总之,从经济范畴着眼,以社会正义为考察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研究,既有利于从理论内核的深度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也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4.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吴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J].探索,2022(4):13-26.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魏传光.马克思关于正义的“生产性”重构及其指向[J].社会科学辑刊,2020(3):73-81.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2.
-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3.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习近平.论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2.
- [14]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美]约翰·E.罗默.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M].段忠桥,刘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18.
- [17] 习近平,等.展山海宏图 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387.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 [19]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0]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M].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7.
- [2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0.
- [22]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5.
-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17.
- [25] 刘洋,李艳芳.回到马克思:全球生态正义的重塑及当代践行[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88-96.
- [26] 刘瑾.马克思消费异化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探讨[J].理论与当代,2022(5):29-32.
- [27] [美]费洛姆.人的呼唤——费洛姆人道主义文集[M].王泽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59.
- [28]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福,全志刚,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3.
- [29]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8.
- [30]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59.

(责任编辑:颜 莉)